



UN LIBRARY

A/CONF.94/21

MAY 20 1980

UN/SA COLLECTION

# 联合国妇女十年 世界会议：

## 平等、发展与和平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至三十日  
丹麦，哥本哈根

以色列的占领对被占领领土内外的巴勒斯坦妇女的影响：

巴勒斯坦妇女的社会和经济情况

临时议程项目 10(a)



被占领领土内外的巴勒斯坦妇女的社会和经济情况

西亚经济委员会区域筹备委员会所通过的报告

目 录

	段 次	页 次
一. 导言 .....	1 - 10	1
二. 研究报告的范围和限制 .....	11	6
三. 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和实践 .....	12 - 28	7
A. 犹太复国主义的因素 .....	12 - 18	7
B. 犹太复国主义的实体：形成期 .....	19 - 28	10
四. 巴勒斯坦人民的人口状况 .....	29 - 37	15
五. 巴勒斯坦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妇女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	38 - 101	19
A. 一九四八年被占领土境内的巴勒斯坦人 .....	38 - 62	19
B. 一九六七年被占领土境内的巴勒斯坦人 .....	63 - 78	30
C. 难民营内的巴勒斯坦人 .....	79 - 101	41
六. 巴勒斯坦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机构 .....	102 - 114	54
A. 被占领领土内 .....	103 - 105	54
B. 被占领领土外 .....	106 - 114	55

秘书长的说明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至十三日在大马士革举行的西亚经济委员会（西亚经委会）一九八〇年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世界会议区域筹备会议议程中列有题为“将巴勒斯坦妇女问题列入一九八〇年世界会议议程”的项目。经过讨论以后，区域筹备会议通过了西亚经委会原来以文号 E/ECWA/SDHS/CONF. 4/6/Rev. 1 印发的报告。这里将该报告附上，以便转交世界会议。

## 一. 导言

1. 如果要认真地处理——即便是片面地处理——巴勒斯坦妇女的问题，就必须真正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实质及其发生的特殊背景。要有这种认识，就不能撇开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来研究这些问题。在研究巴勒斯坦妇女问题时，如果不把这些问题同“巴勒斯坦人民问题”和“巴勒斯坦整个问题”以及一般发展中社会的关心事项联系起来，那么这种研究就不会完整，而且既不会达成目标，又不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达成预期的解决办法。

2. 由于“巴勒斯坦人民问题”具有特殊的性质，因此巴勒斯坦妇女所特有的社会环境就产生并获得其他的意义。“巴勒斯坦人民问题”的特性的根据是更完整的国家性“巴勒斯坦整个问题”，而后面这个问题的特性又来自第三世界和发展中社会所共有的问题。这里“巴勒斯坦人民问题”一词指的是巴勒斯坦人民因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设置殖民点而处的不正常生活环境，不管是由于流放、占领或殖民。“巴勒斯坦整个问题”指的是整个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其含义是在争取独立、统一和社会发展的阿拉伯民族运动同“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和殖民侵入所缔造的以色列之间，在国家一级上的矛盾。

3. 巴勒斯坦妇女所面对的问题的深度和处理这些问题——遑论解决——所需进行的工作的幅度就是在这方面变得十分明显。在广泛的意义上，巴勒斯坦妇女不但在巴勒斯坦社会内，而且在国家范围内都遭受到压制。除了她的作为第三世界社会中的妇女所遭遇的问题以外，巴勒斯坦妇女还同她的同胞一同在国家范围内受到迫害，不论是在以色列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一九四八年被占领领土，或是散居在外。这些问题非常迫切，应许作为优先事项加以研究和判断。国际社会应该特别注意设法解决这些问题。

4. 联合国已经通过一些决议，要求研究巴勒斯坦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情况，并拟订切合实际的具体方案，来协助他们处理重大问题，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在

区域范围内，西亚经济委员会在其第三届会议（一九七六年五月十日至十五日，多哈）所通过的第27（III）号决议中，要求执行秘书“作出安排……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密切合作，对所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及潜在能力进行全面研究”。<sup>1</sup> 同届会议上，西亚经委会在第28（III）号决议中要求执行秘书“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密切合作，尽快开始人口普查行动”

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六年八月四日第2026（LXI）号决议和一九七七年八月三日第2100（LXIII）号决议中，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作为紧急事项并与西亚经济委员会协调，加紧努力以辨明巴勒斯坦人民的社会及经济的需要。” 经社理事会并在第2026（LXI）号决议中要求“这些机构和组织同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协商和合作，以便制定和执行具体项目来保证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社会及经济条件。” 经社理事会敦促这些机构和组织的行政首长“拟订保证执行”该决议各项“规定的建议，并将这种建议提交各该组织或机构的理事机关和（或）立法机关”。

6.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通过了题为“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的第33/147号决议，其中大会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向

---

<sup>1</sup>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2号》（E/5785），第三章。

<sup>2</sup> 同上。

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的各项决议，并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联合国系统内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协商，并与西亚经济委员会协商，加紧努力执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有关决议，以期确定巴勒斯坦人民的社会和经济需要，在不损害各阿拉伯东道国的主权的情况下，为此目的制定具体的计划项目，并为此提供充分的资金，借以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在日内瓦为联合国各组织及专门机构举行了一次会议，研究执行大会第 33/147 号决议的途径。结果成立了一个机构间特别工作组来研究被占领领土（西岸和加沙）境内及其他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民的需要，并根据这个研究拟订具体建议。工作组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西亚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组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在赞同工作组的报告以后，在一九七九年六月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会议上核准拨款 350 万美元，在社会和经济各方面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资金来办理一些具体计划项目。

8.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九日至七月二日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通过了题为“巴勒斯坦妇女和阿拉伯妇女”的决议，全文如下：

“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

“关心到国际妇女年的目的和目标，

“重申《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则，特别是维持国际和平与世界安全和发展国与国间的友好关系，

“深切关怀巴勒斯坦人民目前的政治、社会、人口和经济情况，特别是巴勒斯坦妇女所处的情况，并承认此种情况与巴勒斯坦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

“重申在千百万人民遭受殖民主义枷锁痛苦的时候，谈论人类平等问题，是徒劳无益的，

“认为为了国际合作与和平,必须实行民族独立和解放,消除新老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种族隔离、外国占领、外国统治及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并尊重人权,

“深切关怀巴勒斯坦问题迄今没有得到公正的解决,并认识到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继续威胁着国际和平与世界安全,

“表示严重关怀巴勒斯坦妇女和人民受阻不能享受他们不容剥夺的权利,特别是他们被迫离开本土,流离失所,不能享受重返家园和恢复其财产的权利,也不能享受自决权利及民族独立和自主的权利,

“认识到大量人民离家流亡的情况阻碍妇女参加和参与进展的努力,

“确认巴勒斯坦妇女有权制订一个有力而且更有效的方法,来促进和平并发展国与国间的友好关系,

“回顾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 3236 (XXIX) 号决议和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281 (XXIX) 号决议,

“回顾分别在摩加迪沙、金沙萨和加拉加斯举行的区域讨论会的最后决议和宣言,

“1. 呼吁全世界所有妇女宣布她们团结一致,声援巴勒斯坦妇女和人民努力制止以色列在各占领区内悍然侵害基本人权的情事,

“2. 呼吁全世界所有妇女采取必要措施,使无故被囚禁在占领部队监狱里的成千成万为自决、解放及独立事业而斗争的战士获得释放,

“3. 再呼吁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向巴勒斯坦妇女及人民和阿拉伯妇女及人民提供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援助,以便他们进行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外国占领、外国统治和外国侵略的斗争,并帮助他们按照联合国宪章,恢复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各种不容剥夺的权利,特别是他们被迫离开本土,流离失所后重返家园和恢复财产的权利,自决权利和民族独立及自主的权利;

“ 4. 请联合国及其各机关和各专门机构，以及所有全国性、区域性和国际性的妇女组织，向巴勒斯坦妇女及其组织和机构，提供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援助。 ”

9. 该次会议所通过的《世界行动计划》要求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为妇女参与发展拟订区域行动计划，特别注重每一区域的特性和优先次序。 因此，西亚经济委员会拟订了西亚妇女参与发展区域行动计划，这个计划于妇女参与发展区域会议（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四日，安曼）上最后定稿并获得赞同，经委员会第五届会议（一九七八年十月二日至六日，安曼）无异议通过。 区域计划中有关于巴勒斯坦妇女的特别一节，并视为西亚的优先事项。 此外，关于巴勒斯坦妇女的建议要求委员会执行秘书“设法在关于妇女与发展问题的所有世界和区域会议中列入一个关于巴勒斯坦妇女的议程项目，并从区域筹备会议开始，该会议将于一九七九年举办由西亚各国参加，目的是为定于一九八〇年召开的妇女十年世界会议进行筹备工作。 ”

10. 这项建议后来提交给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世界会议筹备委员会。 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七日）通过一项决定，其中(a) 建议在为世界会议编制的审查和评价文件中“载入巴勒斯坦妇女的社会和经济需要”，并(b) 委托“世界会议秘书处同西亚经济委员会合作编制一份题为“援助巴勒斯坦妇女的特别措施”的报告，经筹备委员会下届会议审议后提交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世界会议。



## 二. 研究报告的范围和限制

11. 许多因素决定了这个关于巴勒斯坦妇女社会和经济情况的研究报告的范围。在这些因素之中，下列因素造成了某些限制：

(a) 由于国际、区域和国家资料来源和参考资料缺乏关于巴勒斯坦妇女和她们生活情况的具体资料，以致不能编写一份完全而综合的研究报告；因此，本报告只是对巴勒斯坦妇女情况所进行的一项严肃研究的骨架而已。希望世界会议将就这里微不足道的零散资料，建议对巴勒斯坦妇女进行一项社会和经济情况的全面研究。

(b) 时间因素限制了可加以安排的研究的数量，尤其是因为现有资料不完全，而且也没有包括不论是在阿拉伯国家国内或是国外的被占领领土所有社区的巴勒斯坦妇女。

(c) 可以提供的工作人员和财力资源有限。对巴勒斯坦妇女情况的彻底研究将需全时工作人员来收集和分析数据，并需财力资源来保证有必要数据收集的机动性。

(d) 最重要的是对巴勒斯坦妇女生活情况的任何研究将因她们的政治情况的特殊性而受到限制，这些特殊性影响到她们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也影响到帮助她们改善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巴勒斯坦妇女构成巴勒斯坦人民的一部分，他们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但却没有土地，没有国家，没有其他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

### 三. 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和实践

#### A. 犹太复国主义的因素

12. 要正确了解“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它在现代中东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它对该区域现有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况的影响，唯一的办法是检查与同时同地发生的其他政治现象有关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时间是十九世纪末叶，地点是“阿拉伯东方”，具体地说就是巴勒斯坦。过去一世纪以来，四个重要的政治现象支配了这个区域的历史，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如此。这些现象的相互作用，它们产生的矛盾抵触以及它们导致的消极和积极作用，造成了阿拉伯世界当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况。这些现象是：

(a) 继中世纪最后一个伊斯兰帝国奥托曼帝国的复灭，某些当时运行的结构随之瓦解，其他结构继之兴起，它们取代了旧有的结构，或是两或同时共存；

(b) 殖民国家在奥托曼帝国广大的版图内争夺势力范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将那块版图分成为几个托管地区；

(c) 阿拉伯民族运动在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范畴内兴起，表现出在伊斯兰人民中阿拉伯民族的特性，这一运动已蜕变成成为寻求独立、统一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政治运动；

(d) 在十九世纪盛行于欧洲的普遍情况下，“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兴起并蜕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试图建议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作为“犹太问题”的解决办法。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因参加了殖民国家的种种活动，故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得到报答，获得了《鲍尔弗宣言》。

13. 在这个历史范畴内，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就是一项为建立犹太移民国以解决犹太问题的计划，结果造成了巴勒斯坦问题。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行动也是西方国家一项将奥托曼帝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的殖民计划的一个构成部分，结果导致了与争取统一和独立的伊斯兰人民的民族运动的对抗。作为一个犹太运动，犹太复国主

义曾经建议了解决犹太问题的一个办法：在巴勒斯坦驱逐本土人民从外移民以建立犹太民族国家。建立犹太民族国家和移民点的这个想法源于当时极为流行的欧洲思想。不过，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自始显然认识到他们的运动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计划，而必须依靠世界上某些或所有强国的支持才能实现其目标。所以，这个运动投入了国际政治联盟，直到今天仍为这种联盟的一个构成部分。因此，在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犹太复国主义从它的殖民背景和它对阿拉伯民族而言的民族背景中兴起出现。如果说这一冲突已影响到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增长和发展，它对巴勒斯坦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妇女的影响无疑将更是重大。

14. 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行动的犹太和殖民两方面一直是不等的。后者为主，给予前者生路。在犹太意义范畴内，殖民国家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伙伴关系一直不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更确切地讲，它总是反映出伙伴之间的均势。殖民主义现仍是“犹太复国主义计划”中的高级伙伴，因此，它在与它有关的政治决定中有最后决定权，并且得到较大的利益。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犹太复国主义行动之后，显而易见的，殖民“伙伴”的成就要比犹太“伙伴”大很多。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在对阿拉伯民族运动和阻止阿拉伯人民，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民进向独立、统一和社会发展方面极为成功。不过，同时，它却不能解决犹太问题，也无法将移民本质转变成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国家。此外，它还造成了“以色列问题”，这是因为以色列移民的孤立及他们无法同该区域人民打成一片融洽共处而引起。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巴勒斯坦问题”，这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民不正常的生活情况而引起。

15. 犹太复国主义文献清楚指出，犹太复国主义领导阶层自始完全知道它的计划的影响，也知道由于巴勒斯坦人民继续留在他们土地上而不能实现其目标。因此他们处心积虑地试图“否定”巴勒斯坦人民并制造一种假象来否定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土地上的存在，所以沙夫茨伯里勋爵的口号“没有人民的土地给予没有土地的人民”可以视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口号。这样作，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目的

是让人以为以这块土地毫无人烟，急待移民来开发。因此而可以说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活动并不会伤害任何人，相反地，它们垦殖大地的一片寸土，将之变成有人烟之地。

16. 在这一行径的假象被戳破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便将他们的宣传变为在文化上否定巴勒斯坦人民，这基本上是更为种族主义的行径。犹太复国主义企图否定巴勒斯坦人民有任何文化特性，说他们性格野蛮，并责怪他们破坏了这块“盛产牛奶和蜂蜜的富饶”土地，将它糟踏成不毛之地和瘴病之乡。但是这些指责已被在那时访问过巴勒斯坦的人所驳倒，这些访客中有一个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领袖之一，叫做阿哈德·哈阿姆，是当时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者的同时代人，他在他自巴勒斯坦发出的信中证实这个国家是发达而且繁荣的，犹太复国主义显然企图使大家相信它在巴勒斯坦的暴虐作为只是试图从野蛮状态中拯救这块土地和它的居民，把这块土地变成西奥多·赫茨尔在《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一书中所说的“一个文明对抗野蛮的进步基地”然而，这一口号因为滥用而很快失去了它的号召力。

17. 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兴起之后，犹太复国主义宣传机构改换了作法，代之以从政治上否定巴勒斯坦人的一种理论以及旨在歪曲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人道主义本质的陈词滥调。在今天已届登峰造极的这个时期，犹太复国主义根本否定了巴勒斯坦人民同他们土地——巴勒斯坦——的民族关系，因此也否定了他们返回巴勒斯坦和争取自治的权利。这便是否定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否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所以也拒绝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态度一直是否定和排斥，巴勒斯坦人民则总是以坚持参与和保持本身文化特性来对抗。

18. 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对巴勒斯坦妇女的影响远比对巴勒斯坦男子的影响为大。因为她们除了承受那个行动所造成的种种影响之外，还得承受以色列建国前后她们自己社会所加诸给她们的压力。显而易见，巴勒斯坦的贫穷人民和社会结构的下层人民，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在内，遭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行动造成的损失要比富人和上层阶级遭受到的损失来得大。事实上，巴勒斯坦人民经历的灾难使巴勒斯坦妇女及她们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成为巴勒斯坦运动所考虑的优先事项中的最末了事项。

## B. 犹太复国主义的实体：形成期

19. 虽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曾说过要与巴勒斯坦人民和平共处，但是他们这些话从来就不能相信。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们从开始就很清楚他们的移民计划所包括的范围，他们也知道要执行这个计划就必须镇压和驱赶巴勒斯坦人民。他们设法利用各种方法企图尽快地完成计划。

20. 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者就设法使土地、市场和劳动力“犹太化”，并且认真地努力地建立侵略的军事工具。“土地的犹太化”实际上就是将阿拉伯人的所有权转移到犹太人手上，从而把阿拉伯农民赶出他们的土地。“劳动力的犹太化”就是迫使阿拉伯工人无法参加生产过程，而“市场的犹太化”就是抵制阿拉伯产品。军事机器的作用就是在必要时，以武力保证这些政策获得实施。因此，设立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点的目的就是破坏巴勒斯坦人在其土地上生活的物质基础。

21. 事实上，犹太移民与巴勒斯坦当地人民之间的斗争并不是因为犹太移民多年来的活动取得成功，而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军事活动和恐怖主义造成。众所周知，巴勒斯坦人民一九四八年离开巴勒斯坦不是因为只有很少土地可供他们利用，也不是因为他们卖了大部分土地，所剩下的不能养活自己。事实证明相反。一九四八年，犹太移民只拥有巴勒斯坦百分之六的土地，同样，巴勒斯坦人并不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或是因为犹太移民提倡“犹太劳动力”政策，抵制阿拉伯劳动力而离开他们的国土。尽管这些移民在“犹太市场”的政策下设法抵制阿拉伯货品，但是阿拉伯货品仍然控制着内外的市场。总而言之，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并不是通过使土地、劳动力和市场“犹太化”的办法而是通过镇压性的军事行动占据该国的。因此，犹太移民占据巴勒斯坦的行动对当地人民有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对巴勒斯坦社会的衰弱和贫穷阶层、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在内。

22 犹太复国主义虽然只在巴勒斯坦一部分的土地上达成其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目的，但是这对其未来政策的决定起了深刻的影响。一九四八年的军事胜利增加了以色列的自信心，加强了领导人的信念，认为可以在一个或多个阶段完成整个计划。他们在驱赶和迁移成千上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且阻止他们返回家园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加强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阶层的“否定”概念。因此，他们展开了行动，他们的基本概念就是当地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只是暂时存在的，如有必要的力量就可把他们赶走。这样分散巴勒斯坦人民，迫使他们解散，一直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中心目标，并且是他们今天仍然奉行的永久政策。

23 犹太复国主义领导深信，人民与土地的关系是由掌握政权的人来支配的。他们一直采取的办法就是中断巴勒斯坦人民与其土地的关系。今天巴勒斯坦人民正遭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迁移他们破坏他们社会制度的结果。犹太复国主义者顽固地执行他们的传统政策，使得巴勒斯坦各阶层的人遭受痛苦。由于被迫流散和社会制度的破坏，使得巴勒斯坦妇女比巴勒斯坦男子遭受到更长久更悲惨的命运。因此，妇女的发展和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不论在窄义的巴勒斯坦社会或在广泛的阿拉伯社会，都被延迟了。巴勒斯坦人民由于敌人的军事胜利，由于他们本身被迫流散，土地被分割，社会结构被破坏，一个发展不足的社会寻求发展和社会成长已不是他们的优先任务了。所有这些因素危及他们的民族意识，并且使得巴勒斯坦妇女提高其社会地位的斗争变成了次要的问题。

24 以色列的建国在破坏巴勒斯坦人民的社会结构和延迟他们的发展和成长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排除”和“否定”办法是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慢慢开始的，到《鲍尔弗宣言》（一九一七年）和在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的时候，这个办法已经相当普遍，一九四八年的军事行动时，它达到了最高峰，自从那时候，他们一直采取这个办法，一九六七年的战争以后更变本加厉。以色列的建国对巴勒斯坦社会最大的损害就是巴勒斯坦社会从其本土上百分之七十的人民所组成的融



合团体，变成了大大小小分散在若干阿拉伯国家或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团体。巴勒斯坦人民不但失去了他们的政治基础，而且民族特性也面临了威胁。

25 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完全征服了整个巴勒斯坦后，继续征服属于邻近阿拉伯国家的其他领土。以色列这样的做法，于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七年期间，完全破坏了在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民所维持的这样或那样的几近正常的生活条件。一九六七年的战争后，原来是生活在他们自己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民就被部分地或整个地转变为三种人群：有的分散在阿拉伯国家或其他地方、有的在一九四八年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受殖民统治，有的生活在被占领的加沙和西岸。这个情况对巴勒斯坦斗争目标的确定起有重大的影响，斗争必然是要解决最紧迫的问题，也就是使人民的不正常生活条件“正常化”的问题。“返回”的问题也就成为最迫切的问题了。

26 值得注意的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计划还没有完全得到实现。不论从犹太利益或殖民利益的角度去看，这个计划还没有完成当初作为政治计划提出时所具有的目标。直到现在为止，以色列仍无法和平地或以武力，根据它自己的条件确实地结束它与阿拉伯国家进行的斗争，以色列也无法使巴勒斯坦人对以犹太复国主义原则为根据的计划言听计从。从犹太角度看，犹太复国主义“解决犹太问题”的口号的意义就是把大多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组成一个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对世界各地的其他少数犹太人伸展其保护和统治。今天，以色列已建国三十余年，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已进行将近百年，但是，犹太复国主义仍没有实现这个中心目标。全世界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犹太人移居到以色列，而他们仍然直接依靠国外大多数犹太人的支持。然而，以色列的大部分政党仍是由犹太复国主义者所组成，它们存在的原因就是继续努力实现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即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纯粹由犹太人组成的国家。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目前进行的努力的主要目标仍是把犹太移民带到以色列，把他们吸收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一部分。鉴于上述情况，

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们必须为实现整个计划而继续努力，否则他们就会失去他们存在的原因，他们是不会愿意这样做的。

27. 由于这些领导继续为实现所有目标不断斗争，在没有决定性地解决意识形态问题以前，他们当然不会要对其计划的人力、地理和政治范围加以确定。事实上，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目前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今天当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但不愿意而且根本也无法就这个问题采取明确决定。因此，以色列缔结或接收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将不是最后的解决办法，而是旨在充分实现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其中一个步骤而已，因之同巴塞尔会议、《鲍尔弗宣言》和以色列建国等等中期性措施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巴勒斯坦问题，阿以冲突问题也不会很快获得解决。就是说，该地区的斗争特别是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与以色列之间的斗争将继续下去，这将会延长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阻碍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巴勒斯坦妇女无法处理她们的切身问题，无法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斗争。

28 自一九七三年起，就所谓的“政治解决”问题就一直进行着会谈和谈判。这些谈判证明以色列并不愿意达成最后、全面和正义的解决办法，甚至也不愿意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号决议的规定达成解决办法。对以色列政治舞台上的活跃政治势力所采取的立场加以分析，以及从它们公开宣布的移民计划，都显然看到以色列当权机构内的任何有效势力都不会接受巴勒斯坦人可以接受的最起码条件。这些最起码条件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制订的，明载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内，该决议要求在每一吋从占领中解放出来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起巴勒斯坦国家。此外，以色列各党派坚持不同的立场，没有一个立场享有以色列权力机构或民众的充分支持，可以构成在进行谈判或缔结协议时的官方立场。因此，至少在可以予料的将来，以色列领导们仍不能就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采取明确立场，所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不采取决定”。

29. 与传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相形之下，可能显示出以色列某些立场



有轻微的改变，但是这些改变离巴勒斯坦人民可接受的最起码条件还是很远，这种情况在许多年内不会改变，甚至在关于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联合国各项决议的范围内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人民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他们驱散流亡在外、家乡被占领的情况之下，也不能接受以色列提出的提议。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并且将会持续很久，从而增加了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他们的斗争将集中在政治问题上，这个问题继续是最迫切的问题，而社会问题包括巴勒斯坦妇女问题将成为无关紧要的问题。 因此，巴勒斯坦妇女得到外面的援助，帮助她们应付日常生活的要求是很重要的。

#### 四。巴勒斯坦人民的人口状况

30。 以色列的兴起使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所开始的破坏巴勒斯坦社会的工作得以完成。 大部分巴勒斯坦居民被迫迁离、放逐和流散，其他的则遭到占领和压迫，从而使巴勒斯坦人民失去形成和维持一个社会所必须的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力量。在一九四八年的战争之后以及一九六七年的战争期间和随后的一段时期里，巴勒斯坦人成群地散居在各个阿拉伯国家或其他地方，面临着各种困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 由于流亡地点的情况不一，加上巴勒斯坦人群在地理上以及一定程度上在政治上遭到隔离，对巴勒斯坦社会的解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它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具有向心力的社会结构。

31。 根据一九二二年官方人口普查，当时有将近75万人居住在巴勒斯坦，其中大约8万人是犹太移民和其他一些在犹太移民运动之前居住在那里的人。 根据一九三一年第二次官方人口普查，在巴勒斯坦的人口超过100万人，其中包括大约175,000名犹太人。 由于从那时以后再也没有进行过官方人口普查，所以各种不同来源所引用的数字都是大约的数字。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的战争爆发前夕，巴勒斯坦人口大约是200万，其中包括大约60万犹太人，他们拥有约150万杜努姆土地，相当于总面积的百分之七。 一九四八年末战争结束时，在战争爆发前就在当地居住的90万阿拉伯人中只有156,000名尚留在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上，这些土地占巴勒斯坦面积的百分之八十。 大约100万巴勒斯坦人集中居住在被并入约旦河西岸以及仍属埃及管辖下的加沙地带。这些人中有一半是从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逃出来的难民，另一半则是当地居民。 此外，在黎巴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约旦（东岸）这些国家里，平均每国有100,000逃来避难的巴勒斯坦人，还有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逃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国家。 从此以后，巴勒斯坦人民的人口分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引起这一变化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一九六七年六月的战争，这一战争使原来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大约50万巴勒斯坦人离开了他们本国。 由于巴

勒斯坦人由一国移民到另一国，特别是由一个阿拉伯国家移民到另一个阿拉伯国家而且更特别是移民到有丰富石油的海湾国家和沙特阿拉伯去，而使巴勒斯坦的人口分布情况受到很大影响。巴勒斯坦人在其所有散居地点的人数的增加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联合国公布的数字特别指出，一九七五年，巴勒斯坦人已达到325万人，其中大约有一半居住在巴勒斯坦境内。据估计，到一九八〇年，巴勒斯坦人将达380万，到一九八五年则将超过450万。

32。一九七五年公布的数字说明居住在一九四八年被占领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已达436,000人，居住在加沙地带的达395,000人，住在约旦河西岸的达775,000人。这就占了巴勒斯坦人的半数。他们分为两大类：那些居住在一九四八年被占领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被官方认为是以色列公民，但实际上却处于以色列殖民主义统治下；那些居住在一九六七年被占领地区里的巴勒斯坦人处于以色列占领下并受到以色列军事当局的统治。同年，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巴勒斯坦人的数字说明，在约旦（东岸）有642,000人（其他参考材料说在约旦河东岸的巴勒斯坦人有100多万）；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有183,000人，在黎巴嫩的有285,000人，在科威特的有204,000人，在其他海湾国家的有10万人，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有195,000人。这些数字还说明，大约五分之一（百分之二十）的巴勒斯坦人仍住在难民营，特别是在一九六七年被占领领土以及在附近的各国更是如此。共有76,000人住在约旦河西岸的二十个难民营，大约20万人住在加沙地带的八个难民营，大约215,000人住在约旦河东岸（约旦）的十个难民营，大约10万人住在黎巴嫩的十五个难民营，有54,000人居住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十个难民营。这样算起来现有难民营地共计六十三个，居住人数总数大约65万人，这个比例数字是很大的。应该注意到，这些难民营多数是在城市附近而且很多已成为那些城市的贫民窟。

33。一九七〇年，在被占领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年令结构统计数字中，出现了一些非常显著的特色，<sup>3</sup>把这些数字同其他几组巴勒斯坦人的数字相比较，也

<sup>3</sup> 《一九七一年以色列统计数字摘要》以色列政府中央统计局出版。

看不出有很大的差异。 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特色就是十四岁以下儿童的比例很高——将近百分之五十，而犹太移民的十四岁以下儿童只占百分之三十。 十五至二十九岁年龄组的人在阿拉伯人中占百分之二十四，在犹太人中占百分之二十六；三十至四十岁年龄组的人在阿拉伯人中占百分之十三，在犹太人中占百分之二十；四十五至六十四岁年龄组的人在阿拉伯人中占百分之八点六，在犹太人中占百分之二十，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在阿拉伯人中占百分之四，在犹太人中占百分之七。 这意味着阿拉伯人中在工作年龄以下的儿童比犹太人多百分之二十，犹太人中有劳动力的年龄组人口（十五岁至六十五岁的人）比阿拉伯人多百分之十六。 这些数字说明巴勒斯坦人出生率很高，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出生率为千分之四十至千分之五十。

34. 一九七〇年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结构按照性别来进行的另一调查说明了另一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在一九六七年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十四至六十五岁年龄组男性的比例较女性为低。<sup>4</sup> 十四岁以下年龄组中，男性的比例略高，十四至六十五岁年龄组中，男女的比例有所不同，在一九四八年被占领地区男女人数几乎相等，但在约旦河西岸，女男之比增高，在加沙地带则更高，而在黎巴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科威特，各种年龄组中，男性的比例都略高。 这一现象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之后的年代中所有增长，说明届工作年龄的年青男子由一九六七年被占领地区向外移民，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情况，特别是对婚龄妇女而言。<sup>5</sup> 近几年这种情形越加严重。

35. 一九七三年，在一九六七年被占领地区对（男女）劳动力的特点进行的调查<sup>6</sup>说明了有很大比例的劳力，特别是妇女劳力，没有参加劳动队伍。 例如，

---

<sup>4</sup> 同上。

<sup>5</sup>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〇年人口普查》；巴勒斯坦研究中心，《巴勒斯坦统计数字》。

<sup>6</sup> 以色列政府，同上，一九七四年。

在约旦河西岸，年令在十四岁以上的341,000人中有214,000人没有参加劳动队伍，这就是说，只有127,000人参加劳动队伍；其中目前受雇的有126,000人。同年，在同一年令组的人中，妇女人数为179,000人，其中159,000人没有参加劳动队伍，只有20万人参加劳动队伍。这20万人中目前受雇的有19万人。在加沙地带这一倾向更为突出。虽然劳动队伍的人数由于以色列市场的需求而已经有所增加，但形势离开自然平衡还相差很远。这说明，巴勒斯坦妇女并未依照她们的人数、才能和潜力情况进入劳动市场，从而使她们不能得到经济上的独立，因而进一步促成她们对社会的依赖。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只不过在极少数地方例如贝鲁特的郊区，情况略有不同而已。

36. 我们得到的数字虽然不够全面也不够精确，但它们说明巴勒斯坦人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很高。例如，一九七一年在黎巴嫩，大学毕业生为千分之二。对巴勒斯坦居民的民意调查说明他们对教育十分重视，认为这是改进社会和经济状况的一个办法。但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发表的数字指出，十四岁学生的数字与六至十一岁的学生数字比较起来下降很多；六至十一岁的儿童中百分之八十八点四在学，但十二至十四岁年龄组的在学率降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一，十五至十七岁的降到百分之三十七点三，十八至二十岁的下降到百分之八点三。学令青少年入学人数极剧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职业学校，迫使很多这个年龄组的青少年在商店、汽车修理站、小工厂工作，或服兵役。

37. 失去土地和国家的巴勒斯坦人只有一个可能投资的领域——教育他们的人民。巴勒斯坦人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唯一显著例外的就是住在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妇女。外援应集中在这两类人的身上。

## 三 巴勒斯坦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妇女的社会和经济情况

### A. 一九四八年被占领领土内的巴勒斯坦人

38. 很自然，以色列对待留在一九四八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应是犹太复国主义总运动犹太方面的延伸，也就是巴勒斯坦的土地、人力和市场的“犹太化”。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了施行政治和社会经济镇压的政策，以使新犹太移民的声势盖过这个国家本地居民的影响。这样以来，本地居民在一夜之间就由多数变成了少数。镇压的基本手段是镇压性法律所支持的军事力量。这些是以色列在占领后强加于阿拉伯少数民族头上的现象，而这种现象至今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向巴勒斯坦少数民族强加军法的首要目的是破坏他们的政治团结，破坏他们的经济，阻碍他们的社会成长。这样，以色列就能把巴勒斯坦人民分割成为类似南非殖民化“班图斯坦”的小群体，以便根除并驱赶巴勒斯坦人民，并在犹太复国主义继后的阴谋中控制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为达到这一目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人施加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民族的和社会政治的压迫。

39. 在一九四八年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宣布了停战。当时，有170,000人民居住在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区。其中，穆斯林大约有120,000人，基督教徒大约有35,000人，德鲁兹教徒约有15,000人，只有几千名巴希人及瑟尔卡辛人。穆斯林大约卡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基督教徒约占百分之二十，德鲁兹教徒约占百分之十。<sup>7</sup> 到一九六〇年，总人数增长到260,000人。到一九六五年，这里的总人数增长到300,000人，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吞并了东耶路撒冷和那里的人民后，增长到400,000人。到一九七四年，总人数便增至五十多万人。这也就是说，在以色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人口自然增长率为百分之四强，这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

<sup>7</sup> 哈比布·卡赫瓦吉著：《以色列占领下的阿拉伯人，一九四八年》（贝鲁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研究中心，一九七二年），英文本第9页。

40. 居住在一九四八年被占领地区的阿拉伯人（不计东耶路撒冷），分别定居在一百零四个纯属阿拉伯人的村落和城镇以及六个阿犹混住的城市。这六个城市为：阿克、海法、雅法、利达、拉马拉和耶路撒冷。大约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包括拿撒勒、夏法、阿姆尔和亚西夫村等四个城市的居民居住在加利利（北部地区）。另外百分之二十的阿拉伯人居住在三角地带（中部地区），其余的分散居住在海法和内格夫地区。数字统计表明，百分之七十的人，包括内格夫地区的贝督因人，居住在农村地区，其余的人住在城市。由于在一九四八年被占领地区内阿拉伯人口地理分布的特点，特别是在上加利利和下加利利，巴勒斯坦居民实际上形成了巴勒斯坦人占多数的多块人口集中地区，又由于这些地区距阿拉伯边界很近，所以这些阿拉伯人的保持着他们的民族联系和民族特点。他们并没有因为在以色列境内处于少数而被淹没，这是因为他们属于在边界之外处于绝对多数的民族，而且在他们自己的居住区他们也占多数的原因。此外，由于军事当局对他们的行动、选择工作和居所的自由加以限制，所以他们与犹太移民点的接触有限。

41. 在以色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尽管他们被认为是以色列公民，但他们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待迁。相反的，他们被剥夺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受到军事手段的镇压，不得参加公众事务和政治、社会、经济生活。《凯宁文件》<sup>8</sup>内载向以色列当局提出的有关阿拉伯少数民族的建议，由这份文件可以认识以色列对待生活在它统治下的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政策。这个文件是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加利利北部地区总督的名字命名的。它实际上是凯宁向以色列内政部长，以后又于一九七六年向总理拉宾提交的备忘录。它本应作为秘密文件保存，但被以色列《每日卫报》报纸刊登出版了。这份文件是对居住在加利利北部地区的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评价，并且提出了一些以色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对付阿拉伯人的建议，在凯宁看来，这些人对以色列安全具有严重的威胁。

---

<sup>8</sup> 见《巴勒斯坦研究刊物》第四期第一篇（一九七六年）。



42. 重新翻阅一下这个文件就可看出，凯宁对两个因素最为担忧，即人口问题和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日益增长的民族情绪。对凯宁来说，“人口问题”即指阿拉伯少数民族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如前所述，这种增长率到一九七八年底将使北部地区的阿拉伯人增至百分之五十一的多数。一九七五年年中，北部地区的阿拉伯人口大约为250,000人，而同一地区的犹太人为289,000人。同年，在北部地区的一些地区内，如西加利利，阿拉伯人口增至百分之六十七，在下加利利，阿拉伯人口增至百分之四十八。他认为这样高的增长率令人担心。那一年，在北部地区的阿拉伯人口增加了9,035人，而犹太人只增加了759人。

43. 凯宁的担心反映了面对每个移民团体特别是以色列的基本危机。当这样一个实体再也吸引不了更多的移民时，它也就完成不了其中心目标。以色列特别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在阿拉伯人口的自然增长使以色列的政治领导感到吃惊的情况下，如何使犹太人的数量保持压倒多数。正是这一自然增长率，使以色列领导在以后的所有对外活动中。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会议上，对鼓励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一事给以特别注意。尽管如此，向以色列移民的人数继续在减少，而从以色列迁往其他地区的移民数量则不断在增加。一九七六年，居住在外国的以色列人大约有300,000人。鉴于向以色列移民的人数在减少，从以色列迁往外国的移民在增加，阿拉伯人口增长率又是世界最高之一，这些事实情况使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发出了人口危机的信号，凯宁文件就是一例。如果不能象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所想象的那样把足够的犹太人吸引到以色列去，犹太复国主义所面临的其次的选择就是使更多的阿拉伯人离开以色列，这也正是凯宁在他的文件中所建议的。这一目的，可以通过骚扰阿拉伯人，对他们实行经济和政治压力，阻挠他们的社会进展和经济增长来获实现。

44. 按照凯宁的看法，一九六七年的战争，对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民族情绪有新的更大的推进，而这种情况又受到开放边界和随之而来的一九四八年被占领土与一九六七年被占领土之间的自由往来以及与约旦河对岸的阿拉伯人的接触的促进。



一九七三年的战争、战后的政法发展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出现以及在国际场合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它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等一系列情况，又进一步加强和促进了这种情绪。凯宁指出，一段时期以来，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数的增长是巴勒斯坦人产生了势力感的基本因素。他还对北部阿拉伯人群分布（他们的民族主义感正在增长）的接近和在那些地区占多数的事实感到惊讶。所有这些都被认为对（加利利）北部地区不利的。而北部地区正是按照一九四七年的分治决议拟建的阿拉伯国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使凯宁担心巴勒斯坦人有可能通过公民投票取得自决，这样无疑是对巴勒斯坦人有利的。因此，凯宁建议，加速加利利地区的犹太化，削弱阿拉伯人口的集中区，并且加紧犹太人移民把阿拉伯人分隔开。他还要求通过更严格、更苛刻的政策，以对付民族情绪的表现，特别是对付各党派和民族领袖。

45. 凯宁还把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的经济状况的改善和他们之中有些人能够积累资本，看成是他们民族情绪的增长、他们权力观念和由此而引起反抗以色列政策的能力的原因。他指出，由于在北部进行发展和“犹太化”计划时缺乏一贯性，结果使原来目的在于吸引更多犹太人到那里居住的计划变成了工作人员中拉阿伯人占去百分之二十五至五十的情况，这些阿拉伯人的经济状况也得以改善。此外，社会保障和其他经济利益使这些阿拉伯人不必担心他们的生活，而使他们有时想到民族和社会问题。最后，凯宁提出如下的建议：

(a) 在国家发展计划中，将雇用阿拉伯工作人员的数字限制在不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b) 增加阿拉伯人的所得税，并加紧税收工作；

(c) 防止阿拉伯代理机构在那里分配消费品，破坏这些机构的工作；

(d) 取消国家对人口众多的阿拉伯家庭补贴，但保留国家对犹太家庭的补贴。对后者的补贴通过犹太代理机构或其他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将津贴转给他们，这些犹太组织是把阿拉伯人排除在它们工作方案之外的；

(e) 努力促进国营机构在工作中，优先考虑犹太人（不论是个人还是团体），其次再考虑阿拉伯人。

46. 在以色列，持有凯宁这种看法的人绝不止他一个。他继续列举了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由于他们享有改善的经济条件、社会保障和福利在教育方面所得到的进展，以及他们在学校和高等学府的入学要求和学费方面得到的好处，这是他们之中民族情绪增长的又一个原因。在凯宁看来，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将会出现更多的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这些人会成为一种对现状不满的政治领导的核心。因此，他提出如下建议：

(a) 增加对阿拉伯人入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的限制，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方面。这样就必然减少学院和大学的毕业生；

(b) 引导阿拉伯学生学习自然和应用科学及专业和科学方面的训练。这些将耗费许多时间，使他们无法参加民族主义和政治的活动；

(c) 多为阿拉伯学生到外国学习提供方便，同时，使他们回国和就业工作有种种困难不便，因而致使他们外移。

(d) 对大学生中的积极分子采取严厉措施。

47. 以上情况表明以色列官员对待在他们统治下的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态度。而正是这个少数民族，以前曾是绝对多数，在这块自己的土地上享有主权。但是由于以色列的兴起，这里的阿拉伯人变成了几乎不起作用的少数民族，成为居住在自己土地上的外侨，生活在由外面移入的殖民者多数人的统治下，这些外来移民者由于阶级和民族情感是与本地人民对立的，而阿拉伯人甚至还被剥夺了在自己家乡生存的权利。尽管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国成立时的宣言曾说：“以色列将致力于建设一个符合所有公民最大利益的国家。它将保持所有公民的政治和社会平等，没有性别、宗教或种族歧视，保证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教育和文化自由”。实际情况是，以色列把在其统治下的阿拉伯人当作被迫害的少数民族来对待，这些人受到了社会、种族和经济方面的歧视。以色列把东方的犹太人看成是二等公民，因此这些阿拉伯人成为三等公民。

48. 这种歧视的例子很多。’ 例如，以色列建国四天以后，就对其控制下的阿拉伯地区实行军事统治。随后，又将这种统治扩大到其它占领区，包括加利利的全部地区、三角地带和内格夫地区。这种统治是根据了托管政府紧急法的规定，该紧急法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组织加紧他们的活动时，强加于犹太人地区的。在托管政府强行实行这种统治时，犹太复国主义劳工领袖多夫·尤赛夫曾加以反对，这个人后来成为以色列政府的司法部长。他说：

---

’ 参阅按照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联合国大会第 2443 (XXIII) 号决议成立的联合国调查以色列影响被占领领土居民人权措施委员会的年度报告。

“问题是，我们是要受合法的恐怖主义的威胁呢？还是个人应享有自由？不能保证一个公民终生都不会不经审问而受到拘留。但对军事统治者的决定是无法上诉的，也没有向高级法院申诉的可能。当局有权不受任何约束地在任何时候将任何公民驱逐出境。甚至，即使一个人没有作错任何事，某些办事机构也足以作出有关其未来的某种决定。这里唯一的选择是要自由还是混乱。当任何国家的当局引起了人们对法律的忿慨、恼怒和不满时，他们就不能期望人们守法。当法律剥夺了公民一切合法权力时，也就无法要求公民守法<sup>10</sup>。”

49. 军事统治是以色列政治当局进行镇压和歧视的最重要的特点，也是阿拉伯少数民族所经历的唯一统治。在以色列，军事统治是建立在限制交通自由、行动自由和选择居住地自由的十五章节共一百七十条规定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条款还限制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些法律给予军事统治无限的权力，并威胁着个人的自由和财产。军事统治还有其特殊的法庭，这种法庭与民事法庭不同，也不隶属于民事法庭。其结果，当然是他们的裁决不容申诉。

50. 以色列军事统治不同与其他类似统治。其不同在于：以色列的军事统治是当局履行驱赶本地居民从外移民的政策工具，它从未把军事统治的任务局向于安全。在以色列，军事统治还负责破坏留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团结，瓦解他们的社会向心力，摧毁他们独立的经济基础。其结果就导致了巴勒斯坦人在经济上的依赖性，使他们受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者的剥削。同时，防止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融合，并保持了他们在犹太复国主义整体中的社会孤立性。在以色列的所有巴勒斯坦人，不管是在城市，在农村，或者是贝督因人，都一律受到军事统治。它影响到所有巴勒斯坦人，因此也帮助了巴勒斯坦人民在反对压迫统治的斗争中促进了团结，帮助了他们在双方对抗日激时加强了政治团结。这也导致了他们对军事当局斗争和抗议的升级，发展出对付镇压措施的手段。

---

<sup>10</sup> 卡赫瓦吉著，同上，英文本第134页。

51. 军事当局的首要任务是镇压巴勒斯坦人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当局的斗争，使他们屈服于受支配的地位，并最后迫使巴勒斯坦人接受政治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歧视。军事当局的另一个基本任务是为实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基本目的——剥夺阿拉伯人的土地所有权——而铺路，进而夺取这些土地，使其“犹太化”。在那些漫长的年月里，军事统治严格实施，直到一九六六年之后，在形式上有些缓和，但实质上并没有任何变化。以色列终能达到了它的大部分目的。它成功地将阿拉伯少数民族在它的统治之下分散成为一块块的人口群居区，居住在这些地区内，但不能成为地方的组成部分。以色列当局将全国分成军事区，只允许那些持有军事统治者发给的特别通行证的人才可以各地通行，使阿拉伯人口孤立地集中在一块块地区，既不能结合在一起，又不能发生相互影响。由于大部分阿拉伯人是农村的农民，以色列夺取了阿拉伯人大部分财产的所有权，就等于破坏了巩固半自主式阿拉伯经济的唯一物质基础。阿拉伯农民被赶出了他们自己的经济领域，而且不得加入国家的经济整体。他们大部分由一个在自己农田土地上自耕的农民变成了雇农，而且大部分是工资低微的季节工，至少在以色列建国后的二十年内一直是这样。

他们在犹太人的劳工市场工作，在阿拉伯人口集中地居住，这种安排与南非的班图斯坦的形式很相象。

52. 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驱赶出他们的家宅、土地和村落，其中有很多人是军事统治时期按照军法被从他们的家园赶走的。在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前，军事当局就有所取舍地从每个阿拉伯村落和城镇赶走数十个人。军事当局派人在天亮之前将村子围起来，先宣布戒严，然后把人们集中到中心广场，在那里加以各种询问，然后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名单，或者是按照当局收到关于这些人或他们的亲属所参加政治活动的情报，找出“不受欢迎的分子”，把他们赶走。驱赶的方法是把这些人用卡车运到邻接阿拉伯国家的边界地区，并把他们抛弃在那里。到现在还仍然使用这种方法。这是继在战争中采用的将人口分散的办法之后所采用的一种办法，它加剧了巴勒斯坦家庭的分裂。其中有的家庭被分成几个部分，分别居住在不同国家。正因如此，在以色列成立的初期，就有人提出了“家庭团元”的问题。

53. 这种分散各处的情形对贫弱的家庭影响特别惨重，而巴勒斯坦妇女，由于和父亲、兄弟、丈夫或儿子分离，遭到许多困难。此外，许多人民逃离后留下的“破碎”农村社区被“并入”大的社区，其中许多人给撤离家园，运到其他地点而且在那里给并入到其他乡村。他们居住在不属于自己的房子，自己原来在乡村的房产则被强占了。作为补偿，给了他们一些不属于他们的土地。这些保守的农人的生活突然渗进了许多变化，造成无数的社会问题。

54. 上百个乡村就此不再有阿拉伯居民，而且这些乡村随后便被拆毁了，他们的所有特色也就随之消失。尤有甚者，某些乡村的居民在各种“安全理由”的借口下被全部迁移一空，当时跟那些村民说，这只是临时措施，等到紧急情况结束后就会取消。时至今日，这些人民在以色列仍然是难民，仍然居住在家园以外的地方，就同加利利上方的阿克拉斯和卡富洪两个边境乡村的居民一样。

55. 从执政党的支持者中选出的军政总督在执行内部政策时，特别是在大选和地方选举期间，自然是该党的工具。军政总督，以其广泛的权力和多方的关系，在差不多完成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级的犹太复国主义任务后，便即刻与其部下进行为执政党服务的工作。他的最重要活动如下：

(a) 以恐怖或诱骗手段干扰议会、市府和地方选举，要它们支持执政党，这种情形特别以选举期间为甚；

(b) 禁止在地方或国家各级上进行任何不依靠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的政治运动，并骚扰与执政党以外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有关连或同盟的组织；

(c) 控制教育系统，特别是在聘用教员方面，因为在阿拉伯圈子里教员的任务重大，另外更施以压力，以确保服从执政党的政治支配；

(d) 鼓励阿拉伯社会内的宗派主义和部落制，从而煽动内部斗争，将人民的注意力从实际问题上分散开来，并孤立和骚扰进步力量，同时支助阿拉伯圈内的传统、反动和勾结份子。

(e) 对于阿拉伯圈内可能增进青年之间同胞关系和提高他们道德、物质水平的社会和文化机构的增长和发展加以阻碍；

(f) 在青年间制造一种忧虑和失望的气氛，促使他们向外移民；采用的方式是，让他们认为自己经常蒙受耻辱，并且认为在心理、经济和政治上遭到折磨；

(g) 设法使当局其他“机构”渗透进阿拉伯圈内，以激起内部冲突。

56. 以色列爱用军事法规和根据一系列以色列颁布的法律从阿拉伯农民手上夺取了上万顷的土地。军事法规的基础，《紧急法》第一二五条规定，军队有权将整个地区划为警戒区、并可以决定出入的期限。此条例特别规定军区司令有权鉴于安全理由宣布任何特定区域或某区域的某部分为戒严区。只要禁止农人耕地三年，该土地便可受到奥托曼法“休耕地”条例的管辖，该条例规定，执政当局有权没收土地，并剥夺土地所有人的拥用权。数年来，以色列颁布了许多法律，允许当局“合法地”没收阿拉伯的财产，以满足该国“犹太化”的需要。军政总督就是执行这些法律，或促进其他行政机关的执行工作的人。同时，军政总督负有“安全阀”的任务，确保民事法庭有利于阿拉伯诉讼当事方的裁决不能得到执行。安排的方法是，宣称这些产权引起争辩的土地—法庭已裁决这些土地属于阿拉伯所有人，当局不能没收—属于“戒严地区”“军事行动”“边区”地区、或“安全防卫地区”。这些土地随后便被没收，并转到犹太复国主义者机构的名下，成为“犹太人民”宗教奉献的土地，不能卖给或租给非犹太人。

57. 阿拉伯农人一旦被剥夺了土地权，他就没有别的选择办法，只有成为被雇佣的或打零工的工人，主要在犹太移居者的农地工作。开始时，以色列移居者同那些土地被没收，并将所有权转到移居者手上的阿拉伯农人达成佃户分享利润的安排（半数或四分之一份）。移居者坐享其作为新的犹太移居者的种种权利，不需付出任何劳力，便可获得大部份的作物。他们只需到土地租赁当局办事处付出极小数额租金便可以了。但是，当局颁布了一条禁止这种安排的法律，巴勒斯坦农人连这点利润都不可能享受到了。以色列立国时阿拉伯乡民从事农务的有百分之七十五，到一九七〇年代终了时，这个比例减至不到百分之二十，明白地指出了以色列在把阿拉伯农人赶出家园和传统的工作方面获得成功。



58. 简括地说，这些居住在一九四八年被占领土地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们的生活中最显明的特点，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是，他们在一个驱逐性移居者实体范围内，从多数人口转变成少数人口，而且失去了他们的经济独立主要基础——即，他们的土地——他们随而转变成在建造或农业方面工作的雇佣劳力，而这些工作一般只是零工性质，所以简言之，即是他们的无产阶级化。因为这种变化不是自然或自动发生的，而是事先计划好而后强制执行的，所以造成了更强烈的影响。

59. 阿拉伯少数民族同以色列在政治、经济和政治所有各级的政策奋力斗争，尤其是抵制以色列不仅作为生产资料，而且作为国土来把阿拉伯土地“犹太化”的总政策，事实上，这一页为土地而战的奋斗史，和他们同土地的深切感情，以及这种密切关系所代表的一切，就是这个少数民族反抗犹太复国主义者殖民主义的奋斗史。阿拉伯妇女加入了这场斗争，也肩负了份内的重担，事实上，她们受到的影响还更为深重有害。但是，当局占了上风，其计划虽然尚未完成，但却实现了它的目标。

60. 为了设法实现它们的目标，占领当局运用所有可能的压制和种族歧视手段，限制行动自由和政治及文化的表达，限制巴勒斯坦人自由选择工作和住处的权利，以及限制其教育机会和社会的成长，并且实施普遍经济压制。从“土地日”或从当局与“米尔亚”村农民之间的冲突可证明一九四八年被占领土地上阿拉伯人的反抗暴露出了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当局所谓的改进占领区内阿拉伯少数民族生活状况的真象。

61. 除了政治压迫和社会及经济破坏政策，以色列还努力消灭阿拉伯少数民族的巴勒斯坦特性，在学校里施行经过详细计划的规划教育政策，按照以色列规划者的愿望确定阿拉伯人的人类和民族价值。这些规划者一直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当作阿拉伯人民的一份子，因而把他们当作“国家敌人”。他们现在居住在以色列，不是由于任何“历史权利”，而是由于以色列所赐予的“生存权利”；因此，巴勒斯坦人须遵守以色列的决定和计划。因此这些学生的国家历史从而被歪曲了，因为



按照犹太人的看法，“应许之地”如没有“上帝的选民”，巴勒斯坦就不会有历史。如果没有“犹太人民”，“属于以色列的整个土地”只不过是一块地理实体，完全没有历史，就如一直住在该土地上的人一样是没有历史的，因为他们不是“选民”。

### B、一九六七年被占领土境内的巴勒斯坦人

62. 自从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占领了西岸和加沙以来，它一直在两个地区施行基于并吞、经济联系、建立移民点和土地“犹太化”的政策，其结果为，人民被迁离或转变为犹太劳力市场的雇佣工人，以便为情况许可时便将这两个地区并入以色列作出准备。实际上，以色列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在加沙和西岸实施的政策，在原则或目标上都同其施之一九四八年占领的阿拉伯地区的政策没有太大的差别。其所采用的政策只在两个地区人口的数量上的一些差异。加沙和西岸的阿拉伯人口密度比加利利或“三角地带”的人口要高得多，特别是与这些地区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点人数相比的话。因此，占领当局在加沙和西岸的行动似乎更为严厉，尤其以最近几年为甚，自从贝京推出了他的“自治”计划，和以色列准备把占领领土并吞的计划明朗化以来，阿拉伯人民和占领当局之间的斗争就日渐加剧。在西岸居民加速他们挣脱占领桎梏的斗争的同时，以色列当局也在加速它们的镇压措施和压迫统治。这种情况使这些地区阿拉伯人的生活遭到广泛损害，严重地危害他们的经济和生活情况。斗争的最终结果自然一定会使这部分的巴勒斯坦人更加苦难，特别是包括妇女在内的贫穷和力量薄弱的部分。在那里进行的斗争的突出的特征是那是一场反抗占领的战争，而且为这场斗争消耗了大部分精力，进行了许多行动，并透支了对人类、社会和经济等其他问题的注意力。

63. 以色列作为一九六七年占领的地区的“解决办法”的基础而提出的建议显然不能构成可供这些地区未来协商的基础；这些建议甚而也未能符合联合国决议范围内要求的最起码的条件，更别提符合阿拉伯人民的一般立场，和基于巴勒斯坦人民合法和不可剥夺权利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具体立场了。贝京的自治计划，其大纲在戴维营获得通过，是一个明白的图谋，设法蒙蔽一个实情，即把一九六七年占领

的领土并吞，但不包括居住其上的人民。该计划订立了办法，把这些人民转变成相当于“班图斯坦”的孤立团体，以便在情况许可时将他们驱逐出境，或者使他们因日常生活情况，不论是政治、社会或是经济的压力而促成他们“志愿移民”。该计划剥夺了他们对于自己土地的政治主权，而其建立移民点的计划使他们不能在这些领土内建立具有独立经济的阿拉伯人团结社会，因为它把所有该领地的土地（占农地的主要部分，并包括所有社区财产和荒地）和所有水源、自然资源等都处于以色列当局的控制之下。

64. 阿拉伯人民成员将有权，至少是理论上，选择自己的国籍。如果他们选择以色列国籍并获得批准，他们便加入了在一九四八年被占领土地上的同胞的阵营，这实在是一种不足以羡慕的处境。如果他们保持现在的约旦国籍，他们便成为生活在外国的民族社区，而实际上他们仍然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居住在自己的城乡，甚至居住在自己的房子内，因而构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独特情况。

65. 大家知道，贝京的自治计划只限于地方服务，因此促使伯利恒市府将它描述为“管理公共清洁和收集垃圾的服务”。该计划还有一个条件是以色列占领军队仍留驻在这些区域内，而且军事管理办事处为了“安全”责任仍然在城市和大的乡村开设。在自治谈判范围内讨论的选举不过是一种强制性公民投票，需要做的只是在占领当局界定的措施上作“是”或“否”的答复而已。所以这种方式根本不是一种决定政治或行政代表本质的自由选举。

66. 以色列反对党根据前外交部长伊加尔·阿隆之名，即当初所谓之“阿隆计划”，提出了另外一份以色列计划。这份计划同规定以色列撤出占领领土，以交换阿拉伯承认以色列合法存在的简单方案对“殖民点”这个字的一般理解也有出入。阿隆计划甚至连安全理事会第242号决议的最低限度条件都不能满足。因为照这个计划，以色列可以兼并面积尽可能大而人口尽可能少的一片土地，而把西岸和加沙地带人口密集的地点还给约旦，这种作法将在协议的规定范围内进行。根据该协议，连接约旦河两岸的桥梁将继续开放通行，而约旦河两岸仍然是“以色列的安全边界”。这份计划的要点是，摆脱占领领土内的阿拉伯人，以便避免人口上的危险后果，并保持“以色列国的种族纯净”。“阿隆计划”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以色列政府，甚至连阿隆本人担任外长的那一届政府，都不采用它。现在，这份计划毫无希望得到以色列统治集团内大多数人的支持，成为以色列据以进行“殖民点”谈判的官方立场。然而，即便没有正式宣布，这份计划一直是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殖民的根据，直到一九七七年贝京政府当政为止。此后，新执政党，利库德党的各种政策使殖民之门大开。

67. 目前还看不出来，在可见的将来有达成任何“解决办法”的可能。目前当政的执政党所提出来的方案是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或以色列人都不能接受的。此外，另外一个政党的计划也是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双方都不能接受的。因此，当前的占领状态还会拖下去，而反抗的斗争也会继续下去，从而导致更多的压迫措施，这就表示，一九六七年被占领地区的巴勒斯坦居民还要遭受更多痛苦。因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应当动员他们的力量，砸碎巴勒斯坦人民身上的占领枷锁，帮助他们挣脱确实无法忍受的重担。

68. 现在把这些领土的各方面情况概述如下：

(a) 以色列从一九六七年占领这些领土起就不断设立平民和准军事性殖民点，公然破坏日内瓦各届会议的决定（《第四项公约》—第四十九条第(6)款）所阐明的国际公约和协定。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也承认这些殖民点有很明显的政治目的。以色

列高等法院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对纳布卢斯附件“阿隆·莫雷”殖民点的裁决就同以色列陆军参谋长易茨哈克·拉斐尔证词所称，“阿隆·莫雷”殖民点是为“安全”理由而建立的说法相互矛盾。

(b) 以色列允许其公民和民事机构在占领领土内拥有土地，违反了国际公约的规定。它还接管领土内的国有土地和自然资源，更对城市和乡村议会施加压力，要它们把重要的公用事业网（如用水、供电、运输一类）同以色列的公用事业网连接起来。

(c) 以色列违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强迫成千上万的人迁离故居，搬到别处，为的是便利占领当局控制一些地区和在尽可能不引起麻烦的情况下，为兼并这些领土进行准备。一个最出名的例子是以色列军事当局强迫成千上万的人从加沙迁往西岸和西奈北部。

(d) 以色列占领当局不准西岸或加沙的巴勒斯坦居民家庭内曾离开巴勒斯坦的成员返乡和同他们的家庭团聚。

(e) 以色列当局通过下列种种办法骚扰加沙和西岸的教育机构：由警察对学生采取行动、镇压学生运动、长期关闭教育机构、削减它们的自由行动权，特别是决定课程和进口课本的权利。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所编写的一份报告指控，以色列当局在加沙和西岸采用旨在瓦解巴勒斯坦的文化的教育政策<sup>11</sup>。

(f) 以色列占领当局对西岸和加沙的当地医疗、教育和社会机构制定种种限制，阻挠“自治”，这种行动同以色列打算兼并这些领土的用心是一致的，但违背了《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决定。该决定规定，除安全的理由外，禁止干预当地机构的工作，而以色列的干预显然不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g) 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领土内，滥施集体惩罚、拆毁房屋、赶走和驱逐巴勒斯坦居民并且不经审判而长期拘禁巴勒斯坦人民。它还强制实施宵禁、限制移动和表达政治意见的自由、限制举行集会的权利、监禁和拷打巴勒斯坦人。

---

<sup>11</sup> 《总干事关于阿拉伯被占领领土人民国民教育和文化生活情况的报告》（教科文组织18/C）。

为调查以色列在这些领土实施的各项措施而成立的国际委员会编写的各项报告，证实这些罪行。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也谴责说，根据日内瓦公约的决定<sup>12</sup>，这些措施侵害了人权。

69. 一九六七年加沙和西岸被占领之后，以色列在两地开始进行并继续到现在的一些活动都是为了使这些领土象一九四八年被占领的地区一样发生一些变化。就在这些领土被占领后不久，就有人提出领土未来前途的问题，而且领土也被称作以色列手中“讨价还价的纸牌”，要到达成“解决办法”后才会撤出。这些意见都是以若干考虑为基础，其中包括对人口问题的忧虑。有几个微弱的声音还提到以色列有变成殖民国家的危险。然而，所有这些意见都反对在经济上把占领领土同以色列合并。不过，当时以前国防部长穆希·达扬为首，负责制定政府政策的那批人认为，占领是打破阿拉伯抵制并通过西岸和“桥梁开放”政策渗入阿拉伯市场，以便剥削这些地区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大好时机。他们对人口问题毫不介意，因为他们深信，以色列总有办法对付这个问题。以色列国防部就一九六七年占领地区经济情况提出的报告说：“这些领土是以色列商品和劳务的补充市场，也是以色列的生产工具，特别是不熟练劳工的来源”。<sup>13</sup>

70. 一九六七年被占领领土实际上很快就同以色列经济发生了连系，并为以色列经济服务。一九六七年被占领领土成为以色列消费品第二个最重要的进口地区，仅次于美利坚合众国<sup>14</sup>；也是以色列市场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廉价劳工来源，仅次于以

---

<sup>12</sup> 参看《国际大赦社一九七九年度的报告》和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和联合国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的措施特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

<sup>13</sup> 以色列国防部，管理地区活动协调小组，《朱迪亚、萨马里亚、加沙地带和西奈北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九年的发展和经济情况：简要》（一九七九年十月）。

<sup>14</sup> 埃里克·鲁洛，“炼狱中的巴勒斯坦人”，《世界报》，一九七三年一月九日。

色列本身。这些劳工，特别是参与季节性工作和收获作物的劳工当中，妇女和儿童占的人数很多。从一九六七年被占领领土来的阿拉伯劳工大量在以色列劳工市场就业，而以农业和建造业特别多，工业较少。他们很快就成为该市场的主要支柱之一。到一九七三年，正式登记的工人有七万多人，这还不算未经登记的工人，他们的人数可能仅达三万五千人左右。未登记的工人多半是妇女和儿童，由于他们没有工作许可证，就更容易受到剥削，也只得任凭雇主或包商摆布。这种情况在以色列本国自由派和劳工工会圈子里引起了激烈争论。

71. 由于阿拉伯工人数目很多，而在工资标准或社会保险和保健福利等方面，占领军也没有对犹太雇主施加任何限制，所以他们很快就成为一九四八年被占领地区阿拉伯兄弟的竞争者。后者在同样的部门工作，然而，多年来在工资和保险方面取得了一些特别的待遇。由于可以减少开支，提高利润，犹太雇主当然喜欢雇用来自一九六七年被占领领土的阿拉伯工人。这些工人，不论是男人、女人或儿童，不仅惨受剥削，而且还要在苛刻和羞辱的条件下工作。包商用自备货车把这些工人运送到工作地点。除了拿到雇用工人的佣金之外，包商还向工人收取高昂的费用。这些工人有时睡在工作地点，常常因没有军政总督颁发的许可证，很可能会违犯军事规定所制定的准则，并遭到逮捕和审判。这项罪名可判入狱或罚款。睡在工作场地的农业工人住在破破烂烂的棚屋里。而建造工人则住在还没有完工的建筑里。警察和民警常常加以骚扰，借此为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反抗行动泄愤。巴勒斯坦反抗行动发生之后，以色列警察的头一个行动常常是把该地区的阿拉伯人赶在一起，任加逮捕、拘留、审问和凌辱。

72. 经济上兼并被占领领土和控制它的进出口、人力和自然资源，替以色列商品打开了广阔的消费市场，为以色列提供大量可以用最可耻的办法加以剥削的廉价、不熟练劳工，也向以色列资本提供新的投资机会。这些政策的结果是：这些领土变成了以色列的“殖民地”，同以色列的连系也日益紧密。同时，以色列靠这些领土发展其经济的依赖性也日益加大，从而增加以色列对它们的依恋，并且从而寻找种种借口，拒绝撤出这些领土和加以吞并。除了占领问题之外，一九六七年被占领领土内的巴勒斯坦人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些领土变成经济殖民地的问題。以色列在经济上的殖民是巴勒斯坦人以及其他有关各方所最重视的问题。他们要通过结束占领状况来铲除这个形式的“殖民主义”。然而，这样做并不见得表示，为改善这些领土内巴勒斯坦人生活状况和减轻他们日常负担而作的种种努力就会松懈下来，对巴勒斯坦妇女来说更是如此。



73. 一九六七年被占领领土内的阿拉伯工人拿不到同犹太工人一样的工资，甚至还比不上在以色列工作的阿拉伯工人。此外，他们享受不到所有各种社会保险、保健、失业救济和辞退补偿。这种情况违背了国际公约的规定，也是对最基本人权的侵害。这些工人大多是“非法地”加入了以色列劳工市场工作，换句话说，他们没有领到居住地区军方办事处所发的许可证。由于“偷偷地”工作，他们很容易被赶走和受到各方面的检举。不论在工资、工作时间、工作性质、谋职和工作上的种种困难或在住处工地间奔波等方面，他们都是在无人道的条件下工作。由于这种惨况太普遍，连几份以色列报纸都挺身而出，发表了一些文章，暴露出这些阿拉伯工人在以色列受到的无理待遇。<sup>15</sup> 此外，以色列雇主还以极低的工资雇用大批阿拉伯儿童，违背了国际公认的劳工法，特别是有关童工的法律，甚至也违反了以色列工会（犹太劳工总会）章程中明定的以色列劳工法。这种行动在国际上和在本地都引起反对这些措施的强烈指责。<sup>16</sup>

74. 一旦以色列劳工市场把一九六七年被占领领土内可能利用的男性劳工都吸收之后，它就开始吸收从这些领土来的阿拉伯妇女。关于被占领领土内阿拉伯妇女情况的研究报告<sup>17</sup>指出，加利利、三角地区、加沙地带和西岸各地村庄的许

---

<sup>15</sup> 在下列几种以色列报纸上都登载过这一类文章：《国土报》（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十日和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和《新消息报》（一九七二年九月八日）。

<sup>16</sup> 参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巴勒斯坦人民机构间工作队向机构间会议提出的报告》，（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第21页和《晚报》，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sup>17</sup> 阿马尔·萨马德，《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妇女的无产阶级化》，《MERIP 报告》，第50期，（一九七六年八月，华盛顿特区），第10至15页。



多妇女都丢下村内的家务，变成以色列劳工市场里的雇工，从事收获作物的工作，或成为纺织业、食品业和制造业的不熟练劳工。这份研究指出，这种趋势是从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后开始的，是以色列经济结构战后发生变动的结果。以色列国防部对被占领领土劳工潜力及其满足以色列市场需要的能力作过研究，其中指出雇用巴勒斯坦妇女的重要性。它说，“西岸各城市和村庄男工的潜力看来已充分加以利用，因此要扩大劳工潜力就必须为此目的动员妇女。”<sup>18</sup>实际上，管理当局设立了七个职业训练中心，在政府的监督下训练妇女缝纫和绣花，为她们进入以色列制衣场工作作准备。

75 然而，领土内的妇女仍然多半没有工作。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观原因是阿拉伯社会当前的社会状况，客观的原因是，被占领领土的经济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因为它被以色列经济所兼并。在以色列开放劳工市场的影响下，向被占领领土内阿拉伯经济独立发动的有计划进攻，以及当地市场上以色列消费品泛滥，都使经济活动混乱，特别是在农业和手工业部门。因此，本地的工作机会减少，争取所余不多机会的竞争就更加激烈，而留给妇女的份额也就微不足道了。由于大部分巴勒斯坦人目前遵从的传统限制了妇女移动的自由，因此，她们不能到远离住所的地方工作。这些妇女大多宁愿操持家务，甚至失业在家，也不愿在当前的情况下工作。不过，在教育、护理和服务业工作的妇女人数正在增加。

76 为了评价经济转变对巴勒斯坦妇女的影响，当前的情况就必须放在这个范围里来考虑：阿拉伯农人普遍从独立的农业工作转业成受雇劳工。而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八八二年在巴勒斯坦设立殖民点就更加快了这种趋势。这种趋势目前仍在继续。由于转业现象是在下面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发生，就同类似的现象有分别以色列根据驱逐本地人的计划进行殖民，从而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产生了一些后果。

---

<sup>18</sup> 管理地区活动协调小组，同上。

要评价转业现象的影响，我们就必须考虑下列背景：

(a) 文化背景. 巴勒斯坦妇女是阿拉伯人，引导她们行动的是她们本族人民和本国所遵从的整个社会和宗教传统。

(b) 民族背景. 巴勒斯坦妇女同她们丈夫一起为以色列经济服务，就增强了以色列继续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国家进行侵略的能力，进一步削弱了巴勒斯坦独立经济的各项要素，即使从最狭义的意义来说，也从而削弱了巴勒斯坦社会的内聚力。

(c) 阶级背景。相当大量的巴勒斯坦妇女由家务劳动转为在农场、纺织厂或制造厂作季节性工作，这并不等于她们已经向改进她们社会地位迈进了一步。而且，如果她们脱离了她们在社会上的传统地位但又得不到能有可以求取上进的永久性工作的保证，那么就只会为她们和社会制造更多的危机，特别是在考虑到前面两种背景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77. 实际上，鉴于巴勒斯坦妇女当前的家庭、民族和阶级情况，她们由从事家务劳动转为季节性的雇工，与其说是改进了她们的地位，倒不如说是加重了她们的社会负担。被占领领土内的巴勒斯坦妇女的问题并不仅限于以色列占领这些领土的一般政治问题，也不仅限于经济、就业或失业等问题或仅限于工作地点、工资或找工作的难易等问题。她们的问题超过了上述所有那些问题，而包括了她们生活中的社会问题，例如下所说的：

(a) 十五岁以上的妇女文盲的比例很高，是男子文盲人数的一倍。<sup>19</sup>

(b) 中学女生人数为男生的一半。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学年约旦河西岸中学学生人数为 31,014 人，其中男生 20,121 人，女生 10,893 人。<sup>20</sup>

(c) 很少有妇女受过九年以上的教育，特别是居住在难民营的妇女，情况就更为严重，因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在难民营里不开办中学，同时也因为做父母的特别偏向于让男孩受教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儿子可以在经济上资助家庭。<sup>21</sup>

(d) 家庭对妇女的限制使她们的行动受到约束，无法到外面去工作。

(e) 由于缺乏托儿所和幼儿园，因此妇女无法到外面去工作。多数的巴勒斯坦家庭都缺乏可以弥补这种情形的办法，所以就更加重了妇女育儿的负担。|

<sup>19</sup> 贾米勒·希拉勒著，《约旦河西岸：社会和经济结构，一九四八—一九七四年》（贝鲁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研究中心，一九七四年）英文本第 196 页。

<sup>20</sup> 同上，英文本第 26 页。

<sup>21</sup> 贾米勒·希拉勒著，同上。

(f) 缺乏能使妇女获得特殊技能的职业训练班和技术训练班，而这种特殊技能在正规学校里是得不到的。<sup>22</sup>

(g) 特别是在难民营，巴勒斯坦各个群体的一般健康情况——营养不良，医疗费用日益昂贵以及缺医少药的情况——使身体最脆弱的那部分人群——妇女和儿童——受到很大影响。对约旦河西岸保健及医疗服务情况的可靠调查说明了一九七三到一九七五年阿拉伯婴儿死亡率由千分之七十上升到千分之八十<sup>23</sup>。调查材料说明医疗服务发生普遍性的危机，特别是与妇女的需要有关的医疗服务更是如此。

### C. 难民营内的巴勒斯坦人

78 巴勒斯坦人民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土地，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最后流散到各地，这种情况总的来说破坏了巴勒斯坦人民的社会结构。特别是给巴勒斯坦人民中的贫弱阶层的成长带来危害。流离失所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一般社会活动的轻重缓急的次序颠倒，特别是那些离开巴勒斯坦到其他国家去的人就更是如此。此外，巴勒斯坦社会阶级的差距越来越大，人民之间的相互影响的作用中断。所有这些，对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巴勒斯坦各个群体的后来发展有着深厚的影响。富有的人和中产阶级分散在各个阿拉伯城市及其他地方，特别是分散在各国首府，忙于使自己在新的环境中安顿下来。农民和贫苦阶级挤在人口稠密的“难民营”里，这些营地大多都变成了贫民窟，他们失去工作、教育、享受医疗照顾及参加政治活动等等的机会。

79 不管这些巴勒斯坦人是聚居在难民营里还是散居在附近的或偏远的城市或乡村，也不管他们是依靠难民救济工程处对难民营的接济，或是已成功地在他们流散的地方安顿或重新安顿了自己的生活，他们在事实上都是“难民”。这意味着他们依赖于居住国形势的发展，依赖于现有的就业机会以及他们具有何等技术和专

---

<sup>22</sup> 同上，英文本第29页。

<sup>23</sup> 同上，第33页。

业知识<sup>24</sup>。一般来说，在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巴勒斯坦后，巴勒斯坦社会的崩溃实际上意味着这个社会所有成员社会地位的崩溃，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80. 依照难民救济工程处的统计数字，一九七五年，在工程处登记为难民的巴勒斯坦人共 1, 652, 436 人，其中 646, 215 人住在难民营，其他人则住在营外。他们的分布情况如下：<sup>25</sup>

巴勒斯坦难民人数 (1975 年)

<u>编号顺序</u>	<u>国别</u>	<u>总数</u>	<u>营地外</u>	<u>营地内</u>	<u>营地编号</u>
1	约旦河西岸	295, 138	219, 136	76, 002	20
2	加沙地带	336, 416	136, 368	200, 048	8
3	约旦河东岸	636, 778	421, 966	214, 812	10
4	黎巴嫩	197, 974	96, 358	101, 616	15
5	叙利亚	186, 130	132, 393	53, 737	10
总 数		1, 652, 436	1,006, 221	646, 215	63

81. 随着独立的巴勒斯坦经济遭到破坏，巴勒斯坦以农民为多数的人口，——当他们沦为“难民”时则成为无地的农业人口——就聚居在难民营里。<sup>26</sup> 巴勒斯

<sup>24</sup> 萨米·哈达维，《惨痛的后果：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六七的巴勒斯坦》（纽约，新世界出版社，一九六七年）英文本第 176 页。

<sup>25</sup> 西亚经济委员会，《巴勒斯坦人民的人口状况》（一九七九年五月八日）英文本第 131 页。

<sup>26</sup> 萨米·哈达维著，《惨痛的后果：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巴勒斯坦》（纽约，新世界出版社，一九六七年）英文本第 176 页。

坦的土地，对巴勒斯坦农民来说，不仅是他们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是他们的文化基础和他们得以延续所继承的传统的构架，以及他们的自尊和在同胞中享有地位的源泉。因此，巴勒斯坦农民丧失了土地，不仅意味着丧失了他们生活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意味着他们的世界和地位的总崩溃。农民们一直没有工作可作，只能靠难民救济工程处分发的口粮来糊口，因为三个主要收容国家——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黎巴嫩——的劳动市场都是很有限的。事实上，这三个国家都是输出劳力的国家。难民救济工程处发给的救济每人每天不超过二角美金，也就是说，如仅靠这个钱是不够的。因此巴勒斯坦人为了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愿意做任何工作，拿任何待迁。这就使阿拉伯的经济力量得到一批廉价且急于工作的劳动力，而不需要具体保证在一般生活条件和社会条件方面对难民营有所改进。

82 尽管发生了积极的或消极的变化，巴勒斯坦难民营依然是一个营地，从未成为一个有机的社会性机体或是一个由得到承认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难民们依照他们所住的帐篷强行分组，连选择地点的自由都没有，其实这个决定也不一定要从社会或人道上考虑。在选定难民营的地理位置时，并没有考虑到难民们的利益。实际上，营地的位置一般来说都不适合人们开展活动，无论是进行工业的还是农业的活动，除非是极其狭义的工业或农业活动，因此生产基础极其薄弱。难民营的居民生活条件极差，现虽有些改进，但仍然很差，居住密度很高，住房条件很坏，缺少基本的服务项目，这一切都不适合群居的社会结构。由于营地缺乏社会或政治领导，缺少就业机会，居民还受到压制和屈辱，使得难民营生活与正常人生活条件相差很远。很自然地，这些具有那么多不利因素的生活条件对居住在难民营的巴勒斯坦妇女有更大更强烈的影响，因为妇女比男子更受限于营地。再加上巴勒斯坦的社会传统使妇女离开现有结构的行动机会受到限制，妇女受的影响就更大了。

83 难民营并不为人们提供可以获得一些资格或技能的条件。事实上，难民营生活的恶劣条件随时使人们想起由于失去自己的家园因而失去的东西。营地居民很少有机会致力于未来目标，他们发现身处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之中。他们渴

望着有一天能重返故乡，因为他们认为客居他乡只是过渡现象，再加上难于离开营地或一般地改变“难民”身份，而且不管他们是阿拉伯人还是其他民族的人，融入周遭社会都很困难。然而这种愿望使他们感到失落、空虚、社会支离破碎，最后导致理想破灭和感情疏远<sup>27</sup>。

---

<sup>27</sup> 哈利姆·巴拉卡特和彼得·多得合著，《没有桥梁的河流：对一九六七年阿拉伯巴勒斯坦难民进行的研究》（巴勒斯坦问题研究所，一九六八年）英文本第32页及以后各页。



84. 显然，这些巴勒斯坦人，不管他们是居住在一九四八年被占领的土地上还是居住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或是分散在其他地方，在以色列建国初期，都不把他们的处境和随后的发展视为是一个应该接受并容忍的既成事实，而认为是“夏日之云”，是一种很快就会消失的过渡现象。对他们来说，“巴勒斯坦问题”做为一个局部问题也好，国际问题也好，仍是一个活生生的问题，必然要得到解决——除非有让他们“重返”家园的办法，否则任何办法都不能认为是真正的解决。因而，他们把自己的不正常情况视为过渡性质的，他们相信他们不需要对这种情况作永久性的打算。

85. 实际上，不管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对这一政治问题的看法如何，巴勒斯坦人就一直未曾被吸收到他们自从家园被占领后所居住地区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去。即使他们至今为止一直居住在这个结构里，他们实际上从未成为这个结构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因为不仅是因为巴勒斯坦人不容易被吸收同化，而且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容许他们被吸收同化。他们所剩唯一的法宝就是坚持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这就需要他们为“重返”家园而努力。这个问题对所有巴勒斯坦人说来都是如此，但对那些居住在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说来就更为突出了，在那里，“重返”的问题高于一切。因而巴勒斯坦难民营成为任何提出办法，包括吸收和重新定居在内都解决不了巴勒斯坦问题的象征。因此，它成为一切积极的或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的政治力量的目标，无论它们的背景和方法如何。这对难民营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影响，但并未使难民营生活好过些。

86. 因而很自然地，难民营就成为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重返家园的权利的政治活动中心。巴勒斯坦难民营也就成为所有反对它们的政治力量的目标。营地居民遭受最严厉的压制和恐怖统治，整个营地遭受以色列凌厉的侵略。除了生活条件很差之外，人们还被剥夺了社会活动权利和遭到政治上的压制，这些人口稠密的聚居点成为“以色列报复行动”或“惩戒攻击”的目标，很少有营地不受到集体压制、不加区别地炮轰或有计划地破坏。联合国的档案里充满了以色列袭击巴勒斯坦难民

营的记录，联合国组织也通过了无数的决议谴责以色列进犯这些营地。尽管如此，一些营地，特别是那些离以色列边界较近的营地，情形更是不堪设想，就例如今天在南黎巴嫩的那些营地，它们不断地受到不加区别地炮轰。由于巴勒斯坦难民营不断遭到攻击，一些难民营的居民组成流浪车马队，他们不定居而是被迫由一个营地移到另一个营地。这种做法只能加重人民的痛苦。对巴勒斯坦难民营的袭击不但致使许多人丧生，而且剥夺了他们即使在艰苦条件下的一点安定生活，并且剥夺了他们的社会和物质基础，使他们尤其是在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无法获得发展某种程度的社会向心力的最起码条件。

87. 难民营的生活不但艰苦，受到压制而且不安定，并且还破坏了人们的主动性、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难民营居民与外界隔绝，很少有就业机会，也没有受任何训练或获得技能的条件来上进提高，只得一直倚靠难民救济工程处的口粮，领受口粮有违人格自尊，对难民营居民的心理有破坏性影响，因而对团体的士气也有很坏的影响。难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而感到内心无比沮丧，前途渺茫，这种情况何时了。他们感到不满的是他们在丧失了土地、钱财、尊严和自尊心之后，在营地虚度时光而对此无能为力。巴勒斯坦男子，特别是青年男子对他们自己无力改变现状而感到沮丧和无能为力，这种感觉对巴勒斯坦妇女来说更为强烈，因为她们的生活是与她们受到挫折并且无能为力的丈夫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88. 巴勒斯坦难民营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地位的边缘化，特别是指独立的巴勒斯坦经济而言。当难民营出现巴勒斯坦劳动力时，经常是用来为收容国或其他地方的阿拉伯经济或外国经济力量服务的，而不是用来建立一个独立的基础使得巴勒斯坦人得以重返家园重建他们自己的社会。难民救济工程处发给他们的救济只够他们勉强糊口，不能满足他们一切需要。事实上，有的人还领不到救济。工程处现已停止对他们的食物和医疗援助，但继续支助他们的教育。在开始的头几年，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劳动力受到令人发指的剥削。他们的痛苦处境，没有就业机会，他们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他们没有工会会员资格，他们无法获得工作许可

证等等，都被利用来保证提供廉价劳动力，使得这些巴勒斯坦人任他们的雇主宰割。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或工会的支持，以争取最起码的权益，有工作能力的营地居民便只能受雇充当季节工或打零工，主要从事农业劳动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建筑工作。起初，由于能找到的工作的性质，营地的妇女比较容易找到的工作是收割农作物或在针织厂工作或帮佣工作。

89. 因此难民营的经济地位一直是处于边缘地位状态，念书成为改善个人生活条作的主要途径。由于巴勒斯坦的社会性质，并且因为父母情愿供男孩而不愿供女孩上学，男子在这方面比妇女有利多了。一般的结果是巴勒斯坦妇女所处的边缘地位的状况比巴勒斯坦难民营总的经济边缘状况还严重得多。

90. 黎巴嫩政府统计处一九七一年所统计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劳动力潜力的数字说明了这种边缘性。<sup>28</sup> 这些数字说明大约百分之六十的工人仍是按日计酬，只有百分之八的工人订有长期合同。这些数字还说明，百分之二十一的工人受雇于季节性的农业工作，百分之十三点六的工人在建筑业工作，百分之十二的工人受雇工业，百分之二点四在运输业工作，还有百分之十四点四则在商业及旅馆业工作。这些数字说明，所有工人中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七从事“其他工作”或“未说明的工作”，劳动队伍中只有百分之四十是确实有工作。<sup>29</sup>

91. 最近作的另一个调查<sup>30</sup>说明在所有有工作的人中，大约百分之六十三的人收入不到500黎巴嫩镑（少于200美金）。这个调查还说明，青年从事的工作和

---

<sup>28</sup> 罗斯玛丽·萨伊著《巴勒斯坦：从农民到革命者》。（伦敦泽德出版社，一九七九年），英文本第120页。

<sup>29</sup> 同上。英文本第121-122页。

<sup>30</sup> 萨米尔·阿尤卜，《巴勒斯坦的阶级结构》（未发表的论文，阿拉伯大学）。

他们父辈和祖父辈的工作相较有根本的改变。接受调查的人中大约百分之八十是受雇，而他们的祖父辈百分之七十六、他们的父辈百分之六十是属自雇。这一倾向说明巴勒斯坦人的总趋势是脱离自雇的状况，它强调这一事实即，巴勒斯坦人从他们自己不能控制而且只能以间接的方式加以影响的经济中得以维生。这一调查还说明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没有永久性职业的保证，迫使许多人从事不只一项工作。对调查提纲作出答复的所有人中，大约百分之七十五表示对他们当前的工作不满，不满的原因或由于工资低、工作条件艰苦，或由于上级对他们的态度不好等等。

92. 调查所得的一项最明显结果是，被调查的人中约有百分之八十五表示，他们不相信个别巴勒斯坦人可以改变本身的社会地位。难民营居民举出若干理由来解释这种看法，最重要的是：

(a) 依赖性。难民营内一直普遍存在着依赖心理和绝望情绪。这种心理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近东救济工程处所提供的服务的性质。难民从这种心理逐渐变成依赖各个阿拉伯国家，在较小程度上也依赖联合国，来为他们解放家园和收复房屋财产。由于这种心理，难民普遍感到无能为力，从而造成个人无法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sup>31</sup>

(b) 压迫和恐惧。如上所述，保安机构在难民营内实施严密监视，居民的一些基本自由如行动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遭受剥夺。难民营没有保护集体安全的能力，特别是面对以色列的攻击，因而一向是以色列不断侵略巴勒斯坦人民的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少最起码的安全稳定，居民很少采取自发性行动。设法改进自己状况的努力也很少。

(c) 受支配。难民营内的普通人、特别是妇女受到各个方面的支配。宗族主义仍然支配着农民集团，年长一代支配青年一代，男人支配女人，父亲支配儿子，兄弟支配姊妹，所有的人都受近东救济工程处官员的管辖，特别是在关系到他们生活资料和工程处所提供服务的各项上。此外，巴勒斯坦难民营须服从所在国的机构、法律、条例和规定，营内居民除顺服外别无选择。他们受恐惧的支配，服从和降伏乃理所当然，不听从命令就会遭致外来压迫。难民营居民的反抗和愤怒长期遭受镇压，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直到巴勒斯坦革命爆发，情况才完全改观。

(d) 停滞和恶化。难民营虽继续保持各种机械联系借以维持起码的社会团结，

---

<sup>31</sup> 巴辛姆·塞汉著：“革命潮流下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公共事务期刊》，第41和42号（一九七五年），英文本第432—440页。

但缺少社会发生相互作用和成长所最需要的有机团结的所有要素<sup>32</sup>。巴勒斯坦体制倒塌后，没有人负起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集体责任。保护和改进社会的机构崩溃后，给巴勒斯坦生命的基本继续带来了真正的威胁。难民营生活开始后，巴勒斯坦社会生活的步伐变坏了，反抗现实的努力大都经不起绝望、无能、消沈情绪的冲击而荡然无存。这种情况是任何努力所无法打破的，直到巴勒斯坦革命爆发，才为难民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93. 现有的数据不够，无法构画出一般流亡情况或甚至某一个地方的社会结构。因为在巴勒斯坦难民营内，没有一定的测量方法和标准；但还是有足够的资料，可以概括说明社会和政治趋势，这些趋势虽不完全适用于难民营，但也离事实不远。这些趋势<sup>33</sup>可归纳如下：

- (a) 巴勒斯坦人的就业一般趋向劳务部门，他们普遍从事低等或中等收入的工作；
- (b) 产业工人阶级形成缓慢；
- (c) 继续被排除于农业部门之外，在农业国家也是如此；
- (d) 从事脑力工作的职业如教书的人日增；
- (e) 受过教育的和有技能的工人移往各石油出产国；
- (f) 出卖劳力为生的家庭依然贫苦。

94. 从上述趋势可以明显看出，教育是难民营居民生活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人研究巴勒斯坦难民营的生活情况都得到这个印象。巴勒斯坦人特别是难民营的居民通过教育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不过，虽然这种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在分散各地的巴勒斯坦人中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教育奇迹”。

---

<sup>32</sup> 阿赫马德·阿布·扎伊德著，《社会结构》第二部分（开罗，阿拉伯印刷出版社，一九六七年）英文本第192页。

<sup>33</sup> 萨伊格著，《同前》，英文本第123页。

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并没有把巴勒斯坦群众教育成熟练工人、教师、医生和工程师；教育也没有象有些人所说的彻底改变了巴勒斯坦人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不过，在流亡的巴勒斯坦人中，大学毕业生所占比例确有明显的增加。巴勒斯坦人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教育是个人乃至团体获致成功和改善生活的关键。巴勒斯坦人被剥夺了土地和家园，他们除了投资人力资源外别无他法。他们通过教育来从事这项投资。父母作出很多牺牲使子女接受教育，这种个人成功的故事比比皆是，每个故事都有其不同经过，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为了接受高等教育和进入专业界，父母和子女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不过，巴勒斯坦人在这方面的成就仍然谈得上是一个“经济周期”，人力资源的投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使社会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团结。

95. 然而，与巴勒斯坦人对教育的热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东救济工程处并无法满足巴勒斯坦难民教育方面的全部需要，即使教育是工程处所提供服务中最好的一个部分。工程处在以下各方面的缺点是很明显的：学校课程、教员训练。所提供教育只限于初级和预校水平，技术学校很少，现有的技术学校水平低落。有一项研究审查工程处在特勒扎塔尔难民营提供的教育服务水平，其中特别指出下列各点<sup>34</sup>：(a) 每班学生太多；(b) 实行每日两班制；(c) 自动升级；(d) 教员不够；(e) 新教员的聘请经常延迟；(f) 不能在学年开始前安排好教员的调动事项；(g) 不能在学年开始时把课本分发给学生。

96. 工程处所发布的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学年学生就学人数清楚指出所谓的巴勒斯坦“教育奇迹”是多么有限。这些数字显示14岁以上学生的退学率很高：

---

<sup>34</sup> 汉妮·曼达斯著，《巴勒斯坦难民营内的工作和工人》（贝鲁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研究中心，一九七四年），英文本第58—60页。



<u>年龄</u>	<u>百分比</u>
6-11	88.4
12-14	67.1
15-17	37.3
18-20	8.3

97. 学生 14 岁时升入中学，然后再进入更高一级教育机构。 14 岁一般也是成熟期，所以女生这个年龄有很多退学。 不过，由于工程处只提供小学和预备班水平的教育，并没有提供中学水平的教育，加上难民营内或附近没有或很少中学，这就增加了退学人数，特别是女生退学的人数。 虽然有少数学校招收退学学生，但能收学生有限。 例如，黎巴嫩的西布林技术学校是唯一一间这样的学校，它只能容纳 200 名学生。 在黎巴嫩其他同类学校就学的费用是难民营居民负担不起的。 结果，很多学生只好到工艺品商店、小作坊等地方去学手艺了。<sup>35</sup>

98. 巴勒斯坦人由于经济上依赖于人、政治上受到压迫而产生的恐惧并没有因难民营近年来的发展而减轻。 即使高收入的巴勒斯坦人也不能安然和有信心地看待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因为他们没有政治力量来保护他们的利益。 难民营内长期艰苦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造成社会不安全，使人对一切价值和信仰发生怀疑，从而可能破坏历史遗产和所有的原则和标准。 即使有一些巴勒斯坦人成功地重建他们的生活，但对整个社会仍然不起作用，从整体来说，巴勒斯坦社会仍然无法选择新的模式或一般的行为方式。 这种情况在地位较低的群体中尤其明显，因为他们受到的影响最严重。<sup>36</sup>

---

<sup>35</sup> 萨伊格著，《同前》，英文本第 120 页。

<sup>36</sup> 瓦吉赫·迪阿德丁著，《在阿拉伯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开罗，阿拉伯研究所，一九七八年）英文本第 150 页。

99. 即使上面列举的事实和数字只有部分属实，这一情况对巴勒斯坦社会的影响仍然相当大，特别是对难民营内的居民；如果这些情况给巴勒斯坦男子带来影响，对无法改善生活条件的巴勒斯坦妇女的影响当然更大。因此，对巴勒斯坦妇女的特殊问题应在尽可能程度内给予的最大注意。

100. 难民营内的一般生活条件使居民易于感染疾病和增加疾病迅速传播的机会。难民营内居民中妇女和儿童最容易生病，他们受恶劣生活条件之害最大。难民营人口太多，人们挤住在卫生条件很差的房子里，有时候10人同住一室。基本设施如自来水、排水设备和公共卫生设备都低于任何起码标准。此外，营内居民收入水平低，因此生活条件恶劣不堪，衣食不周，居住的房子难以抵挡冬寒暑热。各种组织提供的医疗服务够不上最低限度水平。营内几乎没有任何保健措施，特别是因为供水系统暴露无遮，下水道露天，公共厕所既少又不合卫生。此外，居民特别是妇女对公共卫生和保健的基本知识几乎一无所知，使防治和控制疾病的努力难于进行。与性生活习惯有关的保健问题，包括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以及怀孕和生产等问题是营内妇女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在难民营内工作过的医生指出，营内妇女性教育的水平很低，阻碍计划生育工作的进行，特别是因为还有传统观念在作祟。有些报告指出，营内儿童中经常感染传染病如麻疹、水痘、伤寒、百日咳和小儿麻痹症。”肠胃病如消化不良、寄生虫等很普遍，营养不良和疥疮一类寄生虫感染的皮肤病也很常见。妇女中最常见的疾病是贫血症（百分之十）、骨盆部位的毛病、肺病和蛀牙。老年人中最常见的疾病是呼吸器官和心脏机能失调、消化系统的问题、糖尿病、皮肤病、风湿病及其他风湿性疾病。

---

<sup>37</sup> 阿卜杜勒·萨拉姆·胡斯尼著《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进行的深入研究》（贝鲁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规划中心，一九七五年）。

#### 四．巴勒斯坦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机构

101. 巴勒斯坦人民在对抗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计划的斗争中，一直尽力设法把自己组织起来。他们根据各个流散地区的特殊政治形势的需要，成立了种种不同的组织。因此，在被占领领土内外都成立了一些机构，以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某些社会和经济需求。

##### A．被占领领土内

102. 被占领领土内的巴勒斯坦人民遭遇到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些已于上文第五节中加以概述。由于占领或驱散而造成的这些问题，对于家庭生活以及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放逐、监禁、家庭被拆散、教育和就业机会有限以及社会服务有限而且水平很差，因此，成立机构以弥补因缺乏国家结构而造成的脱节现象，成为最迫切的问题。于是，成立了一些多部门的社会机构，在教育、职业训练、保健、社区发展、文化和其他领域内提供服务。这类多部门、多种用途的社会机构通常都是由巴勒斯坦妇女创设和管理的。这些机构往往为很大一批巴勒斯坦妇女提供服务。

103. 目前在西岸将近有一百个民间组织，全部是自愿的、非营利的慈善组织，都集中在主要城市，提供多种服务。

104. 这种社会机构提供那些公营机构所无法提供的服务。领土被占领之后，公共服务收费高昂，对收入有限的居民而言，是一个沉重负担。同时，巴勒斯坦人民的社会和心理倾向也使他们不愿利用这类服务。因此，民间机构必须提供下列各种服务：

(a) 为儿童提供的服务：幼儿园、小学和孤儿院；

(b) 为妇女提供的服务：医院、妇幼保健中心、计划生育指导、识字和家政课程以及职业教育；

- (c) 为学生提供的服务：中学和大学教育奖学金；
- (d) 为身心残缺者提供的服务：习艺训练和教育；
- (e) 一般服务：一般保健、图书馆、向贫穷家庭提供金钱或实物援助。

#### B. 被占领领土外

105. 自一九四八年巴勒斯坦人民遭驱散后，阿拉伯各收容国境内成立了许多社会机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有十八个社会—文化机构，其中包括社会服务组织和专业团体。除了这些机构之外，另设了一些机构提供补充服务，满足不同地理区域的巴勒斯坦人的需求。其中以四个机构对于援助巴勒斯坦妇女特别积极并且有贡献，巴勒斯坦妇女是这些计划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

#### 巴勒斯坦妇女总会

106. 巴勒斯坦妇女总会于一九六五年成立，是巴勒斯坦妇女的唯一民间代表。因此，该组织的行动计划是旨在巴勒斯坦斗争范围内，满足巴勒斯坦妇女的基本需求，并且协助解决妇女的日常需要，尤其是在难民营内。巴勒斯坦妇女总会设立了一些提供种种不同服务的中心，将开办幼儿园列为优先事项，目前的幼儿园仅够容纳 1500 名儿童，需要这种基本服务的儿童总共将近 15,000 名。巴勒斯坦妇女总会也在黎巴嫩设立了两所孤儿院。目前正在建立一个职业训练中心，以增加妇女的就业机会，增加家庭收入，改进妇女的生产技能。

#### 抵抗者组织

107. 抵抗者组织于一九七〇年成立，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生产机构。该机构的最主要目标包括：

- (a) 举办习艺训练，使巴勒斯坦人能够就业；
- (b) 根据巴勒斯坦人，尤其是难民营内的巴勒斯坦人的需要及其购买力，协助

他们生产商品。

(c) 通过制造民族手工艺品，保存巴勒斯坦的历史传统，并且尽可能地广为推销其产品。

108. 抵抗者组织在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巴勒斯坦社区内设有三十三个工作坊，其中百分之七十的工人为女性。这些工作坊的产品有：布匹、毯子、木制和金属家具、革制品、鞋、玩具和儿童用品、塑料制教育器材及传统针织。目前，抵抗者组织正为工人安排识字训练班和在职训练，以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

### 巴勒斯坦红新月会

109. 巴勒斯坦红新月会于一九六九年成立，该组织向居住在难民营内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保健服务。在黎巴嫩一地，红新月会就建了九座医院，共有六百张病床。同时在每个难民营设有诊疗所。一九七六年设立了一个伤残复健中心，可为伤残者提供义肢、物理治疗以及职业训练。

110. 红新月会还设立了训练男女青年从事秘书工作和缝纫工作的三个中心。该组织也设立了训练护士、实验室和X光技术人员及助理药剂师的中心。目前，该组织正忙于将其护理计划落实为建一所护理学校。

### 烈士遗属福利会

111. 许多巴勒斯坦人在自决斗争中牺牲了，他们家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也就此中断。针对这些烈士遗属的迫切需求，福利会于一九六五年成立，支援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烈士遗属。福利会主要是提供金钱援助，满足各种需求。该组织按月提供津贴，并且为儿童提供医疗服务以及小学和中学教育费用。

\* \* \*

112. 国际机构和各种援助来源应特别注意照顾难民营和被占领领土内的生活条

件。 这种援助须经那些为多数居民尤其是妇女、也就是为整个家庭提供服务的巴勒斯坦人的机构来提供是很重要的。 向巴勒斯坦妇女提供援助必须各方协调、计划周详，并且包括长期措施，因为要解决整个“巴勒斯坦问题”似乎还是遥不可及的。 仍将继续强调政治优先，因此，社会问题和需求也就处于次要地位了。这种援助减轻巴勒斯坦妇女的痛苦，缓和她们每天面临的生存斗争。

113. 题为“以色列占领对被占领领土内外的巴勒斯坦妇女所造成的影响：向巴勒斯坦妇女提供援助的特别措施”的文件（A/CONF.94/4）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计划项目提案，将巴勒斯坦妇女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包括在内。 在联合国妇女十年的后半期将计划项目变成具体活动时，可以这份文件作为进行国际合作与协调的准则。

- - - - -